

中国自信

CHINA SELF-CONFIDENCE

纪亚光 著

国家宣言丛书

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史的角度
从当代改革开放取得的实践成果出发
论证中国道路的正确性
提出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和现实依据

① 辽宁人民出版社

国家宣言丛书

中国自信

CHINA
SELF-CONFIDENCE

纪亚光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纪亚光 201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国自信 / 纪亚光著.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9.5

(国家宣言)

ISBN 978-7-205-09510-9

I. ①中… II. ①纪… III. ①社会主义建设模
式—研究—中国 IV. ①D61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00156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电话：024-23284321（邮 购） 024-23284324（发行部）

传真：024-23284191（发行部） 024-23284304（办公室）

<http://www.lnpph.com.cn>

印 刷：辽宁新华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 张：12.75

插 页：2

字 数：180千字

出版时间：2019年5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9年5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马 辉 董 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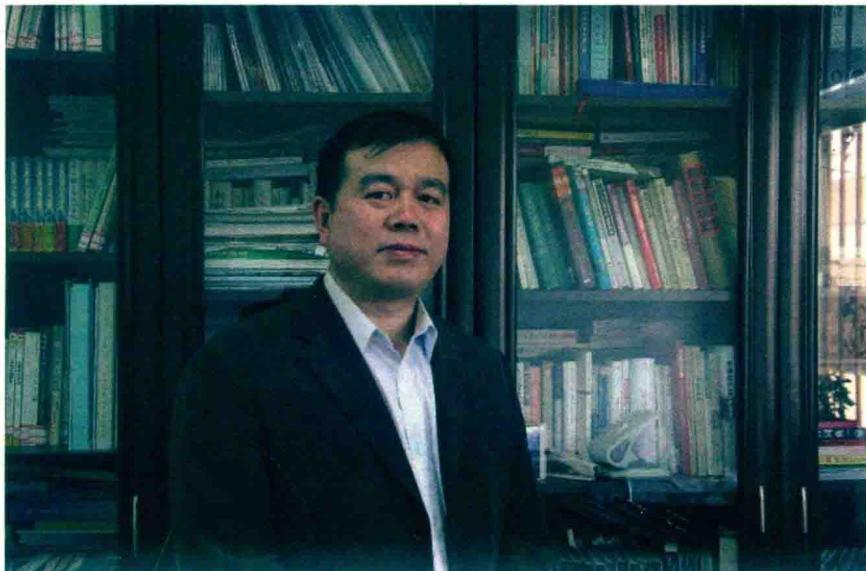
装帧设计：丁末末

责任校对：刘宝华

书 号：ISBN 978-7-205-09510-9

定 价：54.00元

CHINA
SELF-CONFIDENCE



纪亚光

汉族，1969年4月2日出生，南开大学研究生院常务副院长，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指委副主任委员。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基本问题研究、中共党史研究。出版《国共全面内战的缘起》《战后中国政党与政治研究》等学术著作10余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党的文献》《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等期刊和国内外学术会议论文集发表文章100余篇；科研成果多次获天津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

国家宣言丛书

— NATIONAL MANIFESTO SERIES —

编委会

韩喜平 纪亚光 张新平 肖贵清
吴宏政 马国柱 杨永富 许科甲
蔡文祥 张 洪



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中国发展进入了新时代、提出了新思想、踏上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思想，更是为人类谋和平与发展的科学指引。

新时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新时代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时代，也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代。综观世界大势，国际环境波诡云谲，世界治理面临着各种挑战，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发展问题，是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针对如何走出发展迷局，如何解决发展难题的困惑，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越来越希望听到中国声音，越来越期盼看到中国方案，越来越渴求借鉴中国发展新文明。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和对世界的贡献，蕴含在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

到强起来的历史逻辑之中。中国的实践成就和文明成果是在“改革开放40年”的伟大实践中得来的，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近70年的持续探索中得来的，是在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伟大社会革命97年的实践中得来的，是在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由衰到盛170多年的历史进程中得来的，是对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传承发展中得来的，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各种代价取得的宝贵成果”。进入新时代，“强起来”的中国，将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不断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一个和平大国的“强起来”既是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的强，也是中国国际影响力和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更是要让人民的生活更加富裕美好。

文化兴，世界兴。新时代的世界意义核心在于中国的成功在思想文化和文明形态层面给世界更多贡献。这要求我们必须讲好中国故事，创建中国理论，传递中国声音，构建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这套“国家宣言”丛书正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样的大背景下构思编写的。

丛书深入研究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立足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道路的成功经验，面向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从“中国智慧”“中国自信”“中国理念”“中国战略”和“中国方案”五个方面，向世界发出中国声音，以期能够为提升中国道路的世界影响力贡献绵薄之力。

《中国智慧》主要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国共产党革命和建设的红色文化，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为考察对象，从深沉的中国价值的角度，思考中国道路在文化和价值观领域里的基本问题，该部分是丛书在思想高度和价值层面上的展示。

《中国自信》从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历史的角度，从当代改革开放取得的实践成果出发，论证中国道路的正确性，提出中国道路自信的历史和现实依据，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中国改革开放思想的包容性、贯穿始终

的人民性及面向世界的目标取向四个方面切入，突出中国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

《中国理念》突出以新发展理念为主要内容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思想是行动的先导，明确发展理念，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实现发展目标。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准确把握中国及世界发展格局的变化，提出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实践和世界意义。

《中国战略》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着重研究中国走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明确“战略定位”“战略方针”“战略部署”“战略对策”“战略选择”等内容，论证中国战略的理论依据。

《中国方案》着眼于中国的国际担当和外交战略，审视西方发展道路的弊端，提供中国解决世界政治经济问题的方案，展示大国责任、贡献中国智慧，突出“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价值，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宣言”，本丛书遵循问题导向，坚持理论性与通俗性相结合，力图把基本原理、基本概念用更为接地气的语言表达出来，同时，力求用最简短的语言表达深刻的哲理问题。

韩喜平

2019年2月



总序 _001

第一章 / 掌握科学的认识工具

一、民族存亡之际的上下求索	_002
二、推陈比较之后的信仰确立	_018
三、时代大潮之中的理论创新	_032

第二章 / 引发中华文明的深刻变革

一、两个少年的梦想	_050
二、两位伟人的心愿	_063
三、一个新时代的开启	_078

第三章 /

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情怀

一、成敗之鑑	_096
二、发展之道	_114
三、复兴之光	_126

第四章 /

观照人类的前途命运

一、改写了“国强必霸”的逻辑	_144
二、拓展了走向现代化的途径	_159
三、蕴含着全人类的共同价值	_171

结语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之源

一、科学的理论武装指引正确方向	_182
二、人民的主体地位内生不竭动力	_187
三、开放的人类情怀拓展无限空间	_190

后记

_195

中国信
CHINA
自信
SELF-CONFIDENCE

/第一章/

掌握科学的认识工具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为改变屈辱命运，实现民族独立、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不断求索的历史选择。在这一过程中，历经“效法欧美”“以俄为师”“中国特色”三个不断超越的递进阶段，表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蕴含着中西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体现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历史和人民在不断推陈比较中借鉴、汲取、继承、发展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的产物。历史和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指导，缘于其揭示了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一般规律，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国共产党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解决中国实际的过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用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研究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重大问题，以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沧桑巨变，有力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无可置疑的科学性。

一、民族存亡之际的上下求索

在人类社会从蒙昧走向文明的进程中，中华民族创造的中华文明宛如暗夜中灿烂的明灯，特别引人注目。她是最早点亮人类心灵的古代文明之一，与古代埃及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并称为历史最悠久的世界四大文明；她同时也是唯一一直存续到现代、依然辉映在世界东方的文明。曾与中华文明一同普照大地的其他古代文明，在经历了几百年的辉煌之后，全部相继消亡，成为落满历史尘埃的遥远记忆。中华文明的领先和延续，使中国在数千年间一直站在世界文明的中心，不仅为周边民族、国家仰望，也令遥远的欧美诸国向往。美国学者罗兹曼在回望人类文明历程时是这样描述中华文明的：“在世界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中国一向是整个东亚社会的文化巨人，其所扮演的角色，集西方人在文化上无限景仰的古希腊罗马和作为现代欧洲文明中心而倍受倾慕的法兰西于一身。悠悠两千载，中国人表明自己拥有程度极高而造诣极深的多样化文化价值，拥有控制、协调和管理幅员辽阔而人口

众多的国家的能力，拥有有效地把技术开发应用于生产的扩大并维持数倍于19世纪欧洲国家人口的组织天才。中国人过去的生活标准是其他民族根本无法与之比拟的。”^①

然而，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浸润，造就了畸形的家国同构君主专制政体。上自庙堂之中的国家大事，下至黎民百姓的衣食住行，都取决于皇帝、族长、家长的个人意志。与之相适应，中国在政治上兴亡更迭频仍，经济社会发展水平长时期停滞不前。正当中华文化在烂熟中缓慢前行之际，伴随文艺复兴、地理大发现、工业革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欧洲从中世纪的愚昧和黑暗中苏醒过来，跃上了世界文明进程的制高点。在变化了的世界面前，闭关锁国、故步自封的清朝统治者依然陶醉在天朝上国的迷梦之中。1793年，乾隆皇帝面对英王乔治三世通商的请求，断然拒绝道：“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必集，无所不有。尔之正使等所亲见，然从不贵奇巧，并更无需尔国置办物件。”这一傲慢的举动，被作为最具代表性的“自我中心的错觉”典型例证记录在人类文明史中。^②

令乾隆回信在人类文明史中凸显的，不仅是其倨傲的话语，更为重要的是，随后不到50年，英王乔治三世的后人们不仅以非法的鸦片贸易吸干了清王朝的国库和中国人的神髓，更以坚船利炮轰开了大清王朝貌似坚不可摧的厚重国门。以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为起点，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八国联军入侵中国，东方巨龙不得不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战争失败和愈演愈烈的割地赔款，中国遇到“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由主权国家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面临着亡国灭种的严峻考验。

为改变中华民族屈辱的命运，中国人民中的先进分子和仁人志士进行了

^① [美]罗兹曼主编：《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② [英]汤因比著，[美]索麦维尔节录：《历史研究》，曹未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46—47页。

千辛万苦的探索。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林则徐与魏源作为时代翘楚留在历史的深沉记忆之中。1839年，林则徐衔命赴广东禁烟，于坚决禁烟的同时，耳闻目睹，深感“沿海文武大员并不谙诸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来历”。为探知西事“夷情”，林则徐设立翻译馆，聘任通晓英文的洋行买办、通事等翻译在澳门出版的外文报刊中有关鸦片贸易、英国政府动态的评论，汇成《澳门新闻纸》以为备战决策参考。同时，主持编译《各国律例》《四洲志》《对华鸦片贸易罪过论》《华事夷言》等著作，尤以《四洲志》影响最大。《四洲志》依据英人慕瑞著《世界地理大全》编译而成，全书8万余字，概述了五大洲30余国的基本状况，尤其侧重介绍其军队、财政、税收、政事、外交、官制、人口、习俗等现实问题，是我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世界史地译著。

1841年7月，林则徐因鸦片战争失败被贬充军新疆途中，在镇江遇见魏源，将《四洲志》及其他资料悉数相送，托其撰写一部系统介绍外部世界的著述。魏源依据这些资料，独立撰写《筹海篇》总叙、后评，并借鉴《地理备考》《美里哥国志略》及香港英人所著《大宪图》等译稿，于1842年编成50卷本的《海国图志》，后又两度扩展，到1853年终成100卷的巨著，具体涉及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国际关系、民风民俗等许多方面，并附录70多幅世界地图，成为鸦片战争后50年间中国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域外史地著作。

《海国图志》开篇点明了“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的编纂目的，把“悉夷情”放在首位，要求国人抛弃“华夷之辩”的旧观念，虚心了解和认识外部世界，即“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欲悉夷情者，必先立译馆翻夷书始”^①。魏源指出：“夷之长技”有三：“一火器，二战舰，三养兵练兵之法”，并据此提出“师夷长技”的具体方

^① 魏源：《海国图志·筹海篇三·议战》卷二，《魏源全集》第四册，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7页。

案：一是设局造船制炮，掌握西方技术；二是扩展军工生产，发展民用工业；三是借鉴西方养兵练兵之法，整顿军队。在如何“制夷”方面，魏源认为关键是会“善师”。他认为，“西夷之所长，不徒船炮也”，还在于政明与人和，建议朝廷效法西方民主政治，清理官场积弊，改革国政朝纲。《海国图志》将学习西方的行动从“悉夷情”推进到“师长技”的方案层面，“制夷”的思路也从国防建设推及至国政改革和人心整合，指明了社会变革的方向和近代化的路线，成为近代中国学习和研究西方新知的开端，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然而，林则徐、魏源等开风气之先的思想，却被时人看作是为“夷”张目，无人关注，成为空谷足音。林则徐与魏源的落寞谢幕，折射出鸦片战争的失败并没有刺痛大清王朝久已麻木的神经。在一如既往的自得与自大幻影中，清王朝依照既有的惯性，继续向失败的深渊滑去。吊诡的是，此后不久，《海国图志》等著作传入日本，被同样面临西方列强挑战的东瀛邻国视为强国富民的奇书而屡屡翻刻，从而成为日本变革维新的催化剂！

直到鸦片战争失败20年后，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失败苦果的一些大清官员才开始进一步认识到民族危机的严重——“长江通商以来，中国利权操之外夷，弊端百出，无可禁阻”^①。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从中央至地方，奕䜣、文祥抑或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明确提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②。1861年，曾国藩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成为洋务派创建最早的一家军工厂。1862年，安庆军械所研制出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年底建成第一艘轮船，中国开始进入机器制造时代。1865年，容闳奉李鸿章之命，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迅速发展成为洋务运动时期设置较早、规模最大、成效最为显著的兵工厂。此后，洋务

^① 《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三，台北文海出版社1980年影印本，第19、13页。

^② 《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9—10页。

派开始推行规模化的军工生产，至甲午战争前在南京、天津、长沙、汉阳、西安、广州等地创建了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湖北枪炮厂等10余个有关制炮的军工企业。

在现代军事需要的推动下，航运、铁路与电报等通信、交通事业随之兴起。1873年，李鸿章在上海成立了轮船招商局。1879年，天津至大沽之间电报线路通信成功，电报业务随后全面展开。1881年修建从唐山至胥各庄的运煤专线。为支撑现代国防所需矿物能源和巨额经费，采矿、纺织等民用工业相继兴办。这一时期兴办的矿厂，除著名的开平煤矿，还有台湾基隆煤矿、山东淄川煤矿、湖北江夏马鞍山煤矿、山东峰县中兴煤矿、江苏徐州利国驿煤矿，云南铜矿、黑龙江漠河金矿、湖北大冶铁矿等。在纺织业方面，1878年左宗棠创办兰州机械织呢局，1879年李鸿章兴办上海机械织布局，1890—1894年张之洞设立湖北织布局、湖北纺纱局和湖北缫丝局。

洋务派的一系列军事与经济改良举措，遇到了强大的保守势力阻挠。在“祖宗之法万不可变”的浓厚守旧氛围下，洋务派举步维艰。1875年，首任驻外公使郭嵩焘所著《使西纪程》刊行出版，收录了他从上海到伦敦沿途49天的见闻日记，大胆赞扬了西方政教等近代文明，立即引起公愤，认为他“有二心于英国，欲中国臣事之”^①，竞相唾骂其为“郭二鬼子”；李鸿章支持修筑铁路也引起了守旧官僚众怒，引发洋务、保守两派长期的拉锯战，直到甲午战争后，时任河南布政使的额勒精额在议复光绪皇帝自强上谕中仍然坚持“铁路万不可开”的主张。^②更为重要的是，洋务派自身也“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③，遵循“中体西用”指导思想。这种在认识上的局限，使其修复帝制秩序目标

^① 王闿运：《湘绮楼日记》，台北商务印书馆1927年铅印本，第290页。

^② 关于修建铁路的新旧争论详参江中孝博士论文：《晚清官僚的守旧思想与行为探析》，南开大学，2007年，第30—55页。

^③ 梁启超：《李鸿章传》，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版，第184、186页。

下的局部改良，显然无法应对“数千年未有之变局”。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失败。

洋务运动虽然因拘泥于“中体西用”而失败，但在时代大潮的催化下，也孕育了改良维新思想的萌动。1861年，林则徐得意门生冯桂芬写成《校邠庐抗议》一书，通过中西比较，提出“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的处理中西文化基本原则；19世纪70年代首任驻英公使郭嵩焘则指出西洋文化以政教为本，主张正朝廷以正百官。随后，改良思想渐成一股潮流，代表人物为王韬、薛福成、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何启、胡礼垣等。经济上，他们主张振兴商务、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薛福成指出，“欧洲立国以商务为本，富国强兵全借于商”；王韬认为，西方富强的关键在“恃商为国本”，要使中国富强，就必须振兴商务，以发展经济为本；马建忠相信，“治国以富强为本，而求强以致富为先”；郑观应将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手段分为“兵战”与“商战”两种，指出兵战为有形之战，商战为无形之战，商战为兵战的基础，断言“习兵战不如习商战”。^①对于如何进行“商战”，他们主张首先应改变“重农轻商”传统观念与抑商政策，减少官方对企业的垄断与控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一体准民间开设……全以商贾之道行之，绝不拘以官场体统”^②，并主张扩大通商贸易，开采矿山，兴办保险事业，保护海外华侨；在发展工商业的过程中，应学习西方的经济组织与企业管理方法，并建议中央设立商部，地方设立工商工所；鉴于中外关税上的不平等，他们还呼吁裁撤厘卡，收回海关与关税自主权。政治上，他们意识到封建专制制度乃是阻碍“商战”发展的一大痼疾，倡导君主立宪与议院制度，试图通过引进、介绍西方现代政治制度来改变现状。王韬将西方国家政治制度分为“君主之国”“民主之国”与“君民共主之国”进行详细介绍，认为英国的

^①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591页。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12页。